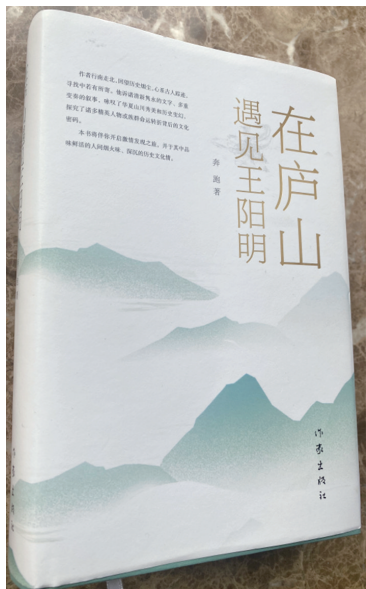


心动之处即是文章 ——读奔跑《在庐山遇见王阳明》

书同



《在庐山遇见王阳明》
奔跑 著
作家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

得好友来如对月，有好书读胜看花。壬寅虎年春节前夕，在马甸桥附近的赣人之家，一次小小的朋友聚会上，奔跑先生赠以新作《在庐山遇见王阳明》，使随后一个寻常的春节，因为每天的阅读，而变得不那么寻常了。

奔跑的文字，譬如《在庐山遇见王阳明》，一看是游记体。但其实不同。依我的识见，他大概综合了徐霞客、余秋雨、王春瑜等各家所长，又能不拘于一家一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的文字只能是他自己的“奔跑体”。他跑来跑去，长城内外，岭南塞北，闯关东，走西口，大漠戈壁，天涯海角。他总是朝着自己心仪的古人进发，也向着心动的友人靠拢。因为彼处有朋友，而去访古问贤；又往往因为访古，而结识到新的朋友。追寻山川之胜，欣赏文化之美，发现历史之幽，感受人间真情，他的文章将自然、人文、历史、社会紧密融为一体，纵横捭阖，出入自由，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，传播中华文化，远远超越了一般游记体散文的写法，又绝不陷入“掉书袋”的窠臼，因而显示出一种知识饱满、情感真挚、文字清通、收放自如的“大散文”格调。

优秀的作品总要先感动作者自己，再感动读者。是所谓“共鸣”。一般而言，作家的写作总需基于自己熟悉的生活，熟悉的人和事。而更高水平的写作，则需要广博的见识，扎实的知识功底，成熟的价值观念，即所谓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悟万般理。记不起是哪位作家，还说过这样的话：（文章）以理胜不如以情胜，以情胜不如以趣胜。奔跑的文章，如这册《在庐山遇见王阳明》，却给人另一种印象，即他所写，都是令他心心念念、百般牵挂感动的人和事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要“做一个伟大灵魂的追寻者”。这显然是一种更高级的“写作方法”。

奔跑先生习惯于用历史和文学构造自己的“叙事”，这是由其专业素养和坚持不懈的写作训练造就的。读《在庐山遇见王阳明》中的《淳熙十三年春》《田园将芜胡不归》《苏州的乡愁》《端午祭》《放逐者的土地》《寻武者不遇》《青藏的短歌行》等篇章，无论远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人如屈原、伍子胥，宋明年代的苏东坡、陆游、王阳明，还是一个老同学，生意上的一个老伙伴，旅行中结识的一个小朋友，只要一经他的描述，则都能立刻活灵活现起来，宛如一个你认识的人。因为动了心，就止不住脚步，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访，吃了鸡蛋还要见到下蛋的母鸡，直到把一个人的行止全部搞清楚，方肯罢休。这样的作派，岂止是“写作技巧”四个字所能概括。他写苏东坡、写陆游、写王阳明、写李小龙，乃至连篇累牍地写友人陶文瑜、写苏州、写岭南、写西北，那实在是一种“问学之道”“交友之道”，加上那么多的“哲理之思”和掏心窝子的“体己话”，叫人读后不能不被感动。

附在此书后面的一篇谈话，富于真知灼见，对于热爱旅行的人来说，极具参考意义。这篇谈话大致道出了奔跑先生关于旅行的一些核心观点，却不局限于旅行，从中大致能看出作者写作“奔跑体”散文的动因。他说，旅行是为了“见天地，见众生，见自己”。他结合自己的旅行经验，提出一场人文主义的旅行，至少要做好“尽量融入本土”“要有一个框架”“要有点全球视野”“要与阅读、写作紧密结合”等四个方面的准备。他还说，要“去理解遇见的人与事”，要“在普通人身上看到大时代”，要“思考当代主题与当下生活”。这些话，显然不能简单当作“旅行方法论”来看，而应从中获得更多的启发。

奔跑先生人贤心雅，真正文如其人。三年前，他的大作《面朝大海，烧水煮茶》出版时，我用差不多两天时间一气读完，并有感而发，写出如下几段话：

读奔跑的文章，似乎满脑子都是“旅行”。换句话说，旅行仿佛是他的职业，或者一份事业，而他也仿佛当世的徐霞客，一个大地漫游者。

旅行的意义是什么？人为什么要远行？依我看，真正的旅行，并不仅仅为了看风景，也不一定要去人山人海的旅游景区，甚至不必跟随旅行团，不必结伴而行。真正的旅行，应该是从熟悉的环境，做一次或短或长的逃离，去寻找和发现陌生，找一些不同日常的感受，寻偶遇，觅知音。

读过《在庐山遇见王阳明》后，这样的感受进一步增强，同时，也进一步领略到奔跑先生深厚的史学素养，深邃的哲学思考，深远的人文关怀。

对散文诗的深度思考 ——试说学者诗人崔国发

王慧骐

在国发先生的朋友圈里，我看到了他发布的一些照片和文字。他对大自然里的美有特别用心的关注，植物园里秋天的树，幽静的弯道上不时飘落的树叶，一片墨绿里凸现的几株金黄……他在行走中饶有兴致地拍下这些象征着生命演绎的画面。

他还喜欢做菜，一盘盘菜做好后摆放出来，很注重荤素的搭配、色彩的变化。作家群里吃货多，美其名曰美食家，其实是眼高手低，一般都不会做。而国发却俨然一名烹饪高手，我虽没品尝过他的手艺，但至少视觉上，他的那些制作勾起了我的食欲。

一个爱美的人，一个不乏生活情趣的人，若再去研究一门艺术，往往就很容易进得去。这一点在国发的身上也完完全全得到了印证。他大约从20岁开始（或许还更早些）对一种表达自由的散文诗产生了兴趣。他读波德莱尔、屠格涅夫、纪伯伦，读鲁迅、刘半农、陆蠡，读郭风、柯蓝、耿林莽，先是大量地阅读，读着读着觉得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比较适合自己，于是他便开始出发实践了。他进入的速度有点超乎常人，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，他在国内的许多报纸和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诗作品，也因此拿到了不少的奖项。而到了1998年，诗人三十四岁。他的另一只手开始发力——写散文诗的同时，推开了散文诗理论这扇大门。由于有了第一手的感知体验，他自然比一些单搞理论的更能点到穴位。大学中文系的出身，本身就具有这方面的功底，一出手就表现出眼光上的凌厉，评析中的准确和独具识见。往后二十多年，他好比小和尚下山，一路都是满目春光。当然这只是一个轻松的比喻，他的创作包括理论上的阐发，每一步都走得极为扎实，每一年都有自己新标高的突破。

他的成绩，我想分两头来说。作为散文诗艺术创新型的实践者，他至少已出版了五部以上的散文诗集。每一年度的全国性散文诗选本，国发的作品一定是必选的，他已成为散文诗界公认的种子选手。耿林莽先生对国发的散文诗可谓是推崇备至，在散文诗重要刊物《散文诗世界》上多次撰文赏析他的作品，认为在画面感和音乐美的运用与表现上，国发的一双妙手经常创造出“神奇的效果”，而一些全然不动声色、平静之极的笔墨，却又时现“意境天成”之趣。耿先生的这些评价都来自于对国发某一首具体作品玩味中的感悟，无疑是贴切的而靠谱的。国发有一首很著名的《青铜》，耿先生赏读时的情态已近乎喜不可抑了，“我已经许久没有读到一篇优异的散文诗而如此激动了。因此，我想，任何解析似已多余，只要将她推荐给读者的面前，他们自然会为之而雀跃欣喜的。”另一位也是具有双栖特

色的评论家王志清教授则发表过专文来谈国发的散文诗，认为他的作品表现出特别明显的“超越时空界限的自由度与灵活性”，有一种令人震撼的“天马行空”的精神爆发力。志清先生特别欣赏国发散文诗集《黑马或白蝶》的书名，认为“马的狂奔，蝶的婉柔”“分别隐喻着两种美学情趣”。而两者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“极度自由”的“飞的意象”，某种意义上，这正是“诗人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生动表现，是其生命精神和理想人格的真实写照”。

另一头，在散文诗理论的进入上，国发兄表现得似乎更为突出。他凭借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和独特的人文立场，对散文诗整体发展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建设性意见。比如就散文诗的“魂、魄、体、翼”这四大要素，在充分论述的基础上，他提出了如何加强的一系列构想；与此相对应的，他又就散文诗人应当具备的人格力量，概括为“才、胆、识、力”四个方面来进行阐释，进而推广他不无真知灼见的全新的散文诗观。

此外，他还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提出“美中生智”的观点，即希望通过散文诗人“自己差异性的‘错位’书写，从司空见惯中摆脱出来，实现从物质到精神的裂变，从现象到本质的勘察，从审美到审智的升华”，进而使作品“生长出思想的颗粒、生命的智慧、自由的精神、人文的关怀、自然的灵性”与宏阔深厚的文化反思。这样的观点一方面深刻影响着他自身的散文诗写作，同时也成为他进行散文诗批评的一把很重要的衡量标尺。对待同道们富有探索精神和鲜明人文色彩的作品，他在称道之余总是给予极为热忱的评荐，这些年来他为海内外一大批散文诗一线上的人物，写出了极具针对性的作家论或作品论。从这方面来看，他对于推动散文诗创作的整体繁荣，无疑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。

尽管南京距铜陵并不很远，但一直尚无机向国发先生当面请益。促发我写这篇小文，是在朋友圈里看到国发抄录的几段“自语录”，为他这种对散文诗的潜心投入而心生感动。谨以上述文字表达对这位学者诗人的敬意。

